

福鼎佛教志

主編·侯傳燭

般若波羅蜜多
經見五箇卷
不異空
空不異色
舍利子
摩訶

福鼎佛教志



主编·侯传烛

福鼎市宗教局
福鼎佛教协会

新华书店
PDG



福鼎县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与领导合影



新加坡居士林副林长李木源居士前来
我市居士林参加弘法大楼落成典礼



国兴寺唐乾符年间
楞伽宝塔



昭明古塔



资国寺福寿园金刚幢

佛教协会多宝佛塔



太姥山白云寺明永乐十五年创建惠明宝塔



硤门瑞云寺镜菜勺



昭明寺梁大通元年塔记

序(一)

福鼎佛教历史悠久,始于南北朝梁大通元年(公元 527),迄今已千余载。佛教传入后,对我市的文化、建筑、雕塑、民俗等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广大信徒走爱国爱教道路,依法加强寺院管理,积极开展禅农并举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我市佛教虽久负盛名,但是见诸文字记载仅清嘉庆十一年县志所涉《寺观》一节。为挖掘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让广大群众和信徒进一步了解我市的佛教历史,发挥佛教的优良传统,服务祖国的经济和文明建设,我局组织专人历时八年,采撮有关史书,实地考察寺院,多方收集资料,深入采访调查,编纂了我市佛教的历史沿革、宗教源流、组织机构、名山寺庙、佛教制度、佛事活动等章节。

福鼎佛教志几经研讨,三易其稿,终于问世。但由于年代久远,难免挂一漏万,有待充实完善。该志的编纂出版既是集体的成果,也是编纂小组全体人员多年劳动结晶,同时得到各方信士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昭明寺青芝法师的支持和新加坡居士林李木源居士的资助,借此机会深表感谢。

侯 传 烛

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

序(二)

佛教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已有二千年之久。且其传播地域广大,迄至今日,其所发生之佛教史实,如建筑、文化等,实在是无量无数,并与中国固有之传统思想相融合,不断变化发展,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之佛教。

佛教传入福鼎一千四百多年。在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几经兴衰,欲将史实编纂奉告于今人和来者,即非容易之事。此佛教志之编纂历时多年。市宗教局和市佛协竭尽心力,力求有关史料之搜集。志中之机构、宗派、沿革、寺庵、人物、文物、艺文等之考据,教义之叙述、术语之表达,皆尽其可能范围之内,章节次第合理,前后脉络之关涉趋于完美。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于教理上言,可谓是中国化。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下,诸多律制仪则发生重大沿革。从南北朝梁代大通年间,佛教始入福鼎。许多民俗渗入佛教,逐渐演成福鼎化。寺院庵堂纵横皆是。在本志中仅概述三十多所寺院,其实际却有二百八十多所,僧尼近三千人之多。然而相当一部分寺院僧人未过佛教教制生活,至于教理研习,如法熏修亦为不多。此不滥矣!有待能仁宗匠振之兴之,众生是幸。

界 詮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

凡 例

一、本志记叙福鼎佛教传播历史和现状。记述时间自佛教传入福鼎开始,下限至 1996 年,部分章节延伸至 1999 年。

二、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档案、佛教典籍文书、“文史资料”,以及寺庵、老僧所提供的书面或口碑和实地调查资料,并经反复考证,尊重历史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反映福鼎佛教自身演变及其兴衰状况。

三、本志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层次结构,采用章、节、目等档次。

四、本志纪年,民国以前采用朝代纪年,夹注公元年号(省略“公元”、“年”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年号。

五、福鼎于 1995 年 12 月撤县设市,撤县设市之前一般仍以“县制”称之,之后改称为“市”。

六、本志所用地名,以今地名为准,必要保留当时地名,则注以今地名。

七、本志行文,除艺文和少量引文外,一律运用现代语体文。

目 录

序一	
序二	
凡例	
概述	1
第一章 历史沿革	10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福鼎佛教	10
一、福鼎早期佛教	10
二、唐朝、五代、两宋时期的福鼎佛教	11
三、元、明、清时期的福鼎佛教	13
四、民国时期的福鼎佛教	16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福鼎佛教	17
第二章 宗派源流	32
第一节 禅宗溯源与传播	32
一、临济宗的源流	33
二、曹洞宗的源流	37
第二节 字号与标志	40
第三章 组织机构	43
第一节 佛教协会	44
第二节 居士林	48
第三节 寺院组织	49
第四章 名山寺院	51
第一节 概况	51
第二节 太姥名山	53
第三节 寺庵选介	56

第五章	佛教制度	82
第一节	僧伽制度	82
第二节	寺院规章	84
第六章	佛事活动	86
第一节	佛事仪式	86
一、	日常课诵	86
二、	社会功德	86
三、	水陆法会	87
四、	开光	87
五、	佛教节日	88
第二节	弘法往来	89
一、	佛学培训	89
二、	佛事交往	89
第七章	农禅与公益事业	91
第一节	禅农并举	91
第二节	慈善事业	92
第八章	佛教徒	95
第一节	佛教徒概况	95
第二节	历代名僧简介	97
一、	古代高僧	97
二、	近代名僧	99
三、	当代名僧	101
第三节	旅居外地名僧简介	106
第九章	典籍与文物	108
第一节	典籍与著述	108
第二节	佛教文物	108
一、	市级保护文物	108
二、	其他文物、古迹	113

第十章	艺 文	114
第一节	碑 记	114
第二节	记 游	121
第三节	诗 词	124
第十一章	大事记	140
附录一:	《福鼎县寺庙管理试行办法》	160
附录二:	一九三八年,释笃山制订的《瑞云寺十二则清规》	166
编后记		168
赞助本志出版单位及个人名单		170

概 述

佛教原产生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的印度。相传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太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所创立。初起时反对波罗门教的纲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波罗门至上)和实践,并以独特的四谛、八正道等教义解释人生和世界的问题。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

汉明帝十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但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马利语系)。

福鼎佛教历史悠久。早在南北朝时期便开始传入。一千余年来,在福鼎城乡广为传播。尤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更加兴盛,境内寺庵遍布,僧徒众多。信仰已深入社会。

福鼎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地处闽浙交界。东临东海。东北与浙江省苍南县毗连,西北与浙江省泰顺县接壤,西界柘荣县,南连霞浦县。陆地面积 1461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14959.7 平方公里。全县人口五十四万,其中汉族占 93%,其余为畲、苗、满、回、壮等少数民族。

清乾隆四年(1739),福鼎始设县。建县虽较迟,但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在此劳动生息。战国时期为七闽的一部分。秦属闽中郡。西晋至齐梁,归属于晋安郡(今福州)。晋太康二年(282),入温麻县。唐武德二十六年(628),归长溪县(今霞浦县)。元、明朝代,升置福宁州府。清雍正年间,府之下置霞浦县,为府属地。福鼎建县时,取名于二十都福鼎山,隶属福宁府。县治设在桐山,故又称桐城。1995 年,撤县设市。境域迄今无大变动。全县现辖桐山、桐城、

前岐、沙埕、店下、秦屿、白琳、点头、礐溪、管阳、贯岭、嵛山十二个镇，以及破门、叠石二个乡。

福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境内丘陵起伏，江河纵横，沿海岛屿星罗。风景优美，名山胜地众多。“海上仙都”太姥山，巍峙市境西南，融山、海、川为一体，以峰险、石奇、洞幽、云雾四绝称雄，与闽北之武夷山并列为福建省国家级重点旅游胜地，同浙江省雁荡山齐名；“南国天山”的嵛山岛内，有“海上天湖”奇观；县区有“桐山八景”之胜。

“天下名山僧占多”。福鼎的优越地理环境和纯朴民风，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佛教传入福鼎后，历朝僧人便在太姥名山和秀美山村，陆续兴建清静佛刹，创造了名胜圣地。据福宁州、府志记载，唐、宋时期，已有寺宇二十余座。清初之前，全县有寺庵七十三座。建县后寺宇达九十余座。古刹至今清净庄严，纤尘不染，常传法轮。

佛教传入福鼎，究起何时、何人，难以稽考。1983年，在福鼎昭明寺出土大梁大通元年之砖证实，昭明寺建于大梁大通元年（527）。据此，佛教传入福鼎可溯至南北朝的梁朝大通元年。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为笃信，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这一时期（502—549），梁朝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座，僧尼达八万二千七百人。座落于福鼎市区十华里的鳌峰山上昭明寺，便是由昭明太子敕建，为福鼎最早名寺。建于该寺的昭明塔，七层空心砖木结构，高25.5米，为福建省现存最早佛塔之一。

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允许人们出家，令丁户出钱营造佛像。佛教遂得以发展。隋开皇二年（582），福鼎在管阳镇广化村建有广化寺。广化村地处管阳山区农村。可见，这一时期佛教已深入到福鼎山村。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这一朝代,不仅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中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等不辞艰辛去印度取经留学。中国佛教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河陵(今印度尼西亚)等地,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联系。在佛教广泛传播的这一历史氛围中,福鼎在太姥山和山村先后广建寺宇。唐乾符四年(877),于太姥山兴建的国兴寺,有石柱三百六十根,全部石砌,规模壮观,为福鼎当时最为雄伟的寺院。宋淳佑四年(1244),该寺被毁,仅存八根石柱屹立旧址,其余均埋地下。乾符六年(879),在国兴寺左旁建造的楞伽宝塔,亭阁式八角形石塔,为国内罕见。唐进士、金州刺史林嵩作《太姥山游记》、《福建三山志》,均载这座宝塔。乾符二年,在太姥山摩霄峰建有摩霄庵,即今白云寺,为福鼎建在最高山峰的古刹。唐太宗大历年间,在太姥山下澈溪西畔兴建的灵峰寺,规模宏大,结构灵巧,风格别致。该寺现存唐、宋石雕六十余方,造形生动,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堪称中华瑰宝。距福鼎城区十华里的资国寺,规模宏伟,旧时寺产达九百六十担田租。此外,还建有白琳潘山庵(永福寺),管阳兴福寺、象山寺,店下清溪寺、资福寺等寺庵。可见在唐朝,福鼎佛教已在城乡传播。并且在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等方面,技艺精湛,丰富了福鼎文化艺术宝库。

隋唐时代,尤以唐朝,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随着佛教义学的蓬勃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大乘各宗派相继建立。重要的有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五祖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印度

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福鼎佛教宗派以禅宗为主。禅宗主张修习禅定，故名。《六祖坛经》说：“外不著相叫禅，内不动心叫定。”其理论，主要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传说该宗始创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神秀北宗门庭寂寞，传不数代即衰亡。惠能南宗遂成禅宗正统，其宗风独尊于天下。惠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分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临济宗在宋代形成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

禅宗闽传宗师有怀海、灵祐、希运、本寂、义存。怀海（720—814），俗姓王，福州长乐人，为佛教闽传宗师。怀海的弟子灵祐（771—853），俗姓赵，福建长溪（今霞浦县）人，十五岁便出家于霞浦东华峰山的建善寺，为沩仰宗创始人之一。黄檗希运，福建福清人，幼年于黄檗山出家。他是形成临济宗的重要过渡人物。黄檗希运嗣法弟子六人，即临济义玄、睦州尊宿、千顷雨、乌石观、罗汉彻、裴休居士。其中，临济义玄承黄檗主旨，开创临济宗。《黄檗山寺志》中曰：“惟义玄禅师为正传，建立黄檗宗旨，一时道播诸方，而临济一宗屹起于此，历七百余年，代不乏人，桃李遍天下，皆师源远流长，故能赫奕如是也。”可见，沩仰、临济两个宗派的创立，禅宗闽传宗师怀海、灵祐、希运作出了重大贡献。而禅宗青原行思一系发展下来，有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其创立与发展，闽传宗师本寂和义存亦贡献突出。

慧能的门徒青原行思传法于石头希迁（700—792）。石头希迁俗姓陈，端州高要（今广东高要县）人，他传下四代，就到曹山本寂和雪峰义存。

曹山本寂(840—901),俗姓黄,福建莆田人。出家后,先从筠州洞山(今江西宜黄县境内)良价(807—869),俗姓俞,会稽诸暨即今浙江诸暨人)学禅,后住抚州曹山(今江西宜黄县境内),因被称为“曹山本寂”。他与良价是“曹洞宗”开山祖。曹洞宗是以师徒所居地洞山和曹山而得名。

雪峰义存(882—908),福建南安人,俗姓曾。他是禅宗祖师惠能的六传弟子。其高徒云门文偃(864—949),俗姓张,浙江嘉兴人、三传弟子清凉文益(885—958),俗姓鲁,浙江余杭人,分别创立云门宗和法眼宗。

禅宗“五家”先后传入福鼎,久传不衰,其中以临济、曹洞两宗为最盛。

从上述可见,在唐代,不仅大兴道场,还创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诸多宗派,奠定了佛教义学的理论基础。

至五代十国(907—960),北方虽兵乱,而南方却较安定。闽王王审知为巩固在福建的统治,大力支持佛教,并礼请禅宗高僧雪峰义存为“国师”。因而佛教持续传播。这期间,福鼎兴建有峡门瑞云寺、桐山郊区鳌峰山下棲林寺、白琳天王寺、店下灵应寺等,其规模和影响都较大。尤以瑞云寺,租产达1440担,为福鼎各寺之冠。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译经规模一度超过唐代。佛教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至南宋,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余各宗已日渐衰微。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而易行,故能绵延相续,直至现今,仍甚盛行。

宋代士大夫中的理学家们,虽思想上取反佛立场,但行动上又多与僧侣交往,并吸收禅宗的一些理论因素。朱熹年轻时学禅,后